

實證史學如何拳拳報國

——評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

● 顧 濤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北京：三聯書店，2012）。

2012年4月，澳大利亞華裔史學家黃宇和來清華大學講學，筆者得讀其新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以下簡稱黃著，引用只註頁碼）。黃著

之所作，據其自陳，因憤激於法國學者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1994年曾「批評大陸自1979年發軔的孫中山史學，不值西方學者一顧」，其中至為切要者在於「中國人天天喊孫中山如何偉大，但對自己這位民族英雄，很多關鍵性的問題諸如他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至今沒有好好解決」，而白氏對這個學術上的重大問題卻又「不屑為中國人效勞」，故黃先生認為「必須由中國人（無論是在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甚至海外的華人）來承擔」（頁643）。

回顧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簇擁於孫中山的豐功偉績和成熟的思想表述，至於「研究其思想如何形成的，卻寥寥無幾」，尤其是孫青少年時代的讀書階段（1879年赴檀香山至1892年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這關鍵的十三年，卻是着力最少的」（頁615）。史料的嚴重匱乏和成見之冥頑不化恐怕是兩隻最大的攔路虎。既然中國大陸及兩岸三地的學者或無識於此，或畏難退縮，作

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簇擁於孫中山的豐功偉績和成熟的思想表述，至於「研究其思想如何形成的，卻寥寥無幾」，尤其是孫青少年時代的讀書階段。史料的嚴重匱乏和成見之冥頑不化恐怕是孫中山研究兩隻最大的攔路虎。

黃先生的基本論證方法為「通過微觀研究，可以解決很多宏觀大問題」，即寓細化考證以綿密深義，在實證與人物生平相關的細微事件中，透視其思想之變遷或前後之線索與影響。

為海外華裔學者的黃先生便毅然擔起這副重擔，十多年來為之殫精竭慮，日夜奮鬥，最終可以說基本解答並闡釋了這一遏制孫中山研究走向縱深的瓶頸問題。

黃著鳳鳴高崗於百年孫中山之學，嚴肅地證實或證偽了大批史實，同時勾稽出一系列新史料，並重鑄其生命，新燃其活力。藉此，我們可以鮮活地撫觸到孫中山三十歲前活潑潑的內心世界。筆者以為有必要將黃先生如何對思想流變施諸實證之理論與方法，以及其於實證功底中內蘊的拳拳抱負與殷殷關切予以昭示與抉發，企望國內外學界共同見證這部實證史學的里程碑著作。

一 二十五處大關節

分析三十歲前孫中山思想之積累與變遷是貫穿黃著的主旨，筆者認為，黃著圍繞孫在前三十年人生履歷上受到甚麼影響、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着力實證並悉心整理的主要有二十五處大關節（見表1）。這也是全書的邏輯主線所在。

由表1可見，黃先生的基本論證方法為「通過微觀研究，可以解決很多宏觀大問題」（頁641），即寓細化考證以綿密深義，在實證與人物生平相關的細微事件中，透視其思想之變遷或前後之線索與影響。這在黃著各章首尾已有一些伏筆，諸如「像本書第二章探索孫中山的祖籍問題，第三章鑒定孫中山出生於甚麼房子一樣，現在（第四章）如此大費周章地考證坐甚麼國籍的船往夏威夷此微觀小節，是要了解一

個宏觀的重大問題，探索孫中山的現代化革命思想來自何方」（頁175）。

以第一、二個關節問題為例，黃先生之所以花大筆墨考證孫中山的祖籍與出身乃是由於：第一，「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筆者徹查孫中山是廣府人還是客家人這一微觀事件之主要目的，是為了給其最初進行革命時的基本支持者是誰的問題找尋線索」；第二，「牽涉到的另一個宏觀問題，是孫中山是否貴胄後裔。……貴胄後裔與貧窮的農家子弟，對於革命思想之萌芽，其腦袋提供了不同的土壤」（頁14）；第三，「富裕與貧寒，也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情操——是謙虛還是狂妄」；第四，「家庭背景之貧富也影響到一個人的健康……若體質孱弱不堪，儘管矢志革命，也有心無力」（頁116）。一句話，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將深遠影響其日後人生軌迹之可能發生的大轉折，也對其成年後構築成熟的思想框架產生根基性的作用。兩者的緊密程度如此，因此務必於事實層面作精密考證，方能為思想脈絡的分析提供踏實的基礎。

與此相類，黃著又詳涉韋禮士 (Alfred Willis) 主教為意奧蘭尼學校 (Iolani School) 之所投入、綱紀慎傳道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 塞繆爾·諦文 (Samuel Damon) 和芙蘭·諦文 (Frank Damon) 父子赴檀香山傳教以及後者在瓦胡書院 (Oahu College) 任教之經歷，繼而大花筆墨鋪敘中央書院之課程設置、西醫書院之創立步驟……皆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然善讀之者，由表1之二十五處大關節入手，便能窺得作者之良苦用心。歷史實證與思想

表1 《三十歲前的孫中山》二十五處史迹實證及思想分析

出身與經歷 (地點、時間)	實證相關史迹	發明思想脈絡
祖籍	孫的近祖南遷廣東於東莞縣，其為廣府人(即本地人)，非客家人，幾世均農家子弟，無顯赫世系。	孫的窮苦出身「對他構思其三民主義之革命思想，有着深遠的影響」(頁165)，具體而言：「後來所構思的那種充滿家長色彩的民主主義」，「後來所構思的民生主義」，「民族主義的初步階段——反滿主義」均「發軔於他的童年時代」(頁165-67)。
出身 (翠亨， 1866-1875)	孫誕生於「窮鄉僻壤翠亨村的最邊緣的一所泥磚屋中」(頁126)，家境極度困苦，幾難以鬪口，且備受稅吏敲詐。	
村塾 (翠亨， 1876-1879)	孫在村塾即記誦過《三字經》之類的書籍及四書五經的部分內容。	中國優良的傳統價值觀和儒家的哲理，「不但影響了他將來的行動，也直接影響了他思想的發展」(頁144)，此後在香港有進一步的自覺研求。
出航 (澳門，1879)	孫跟母親經澳門乘坐英國火輪船S.S.Grannoch號赴檀香山。	英輪的「鐵樑與蒸汽機代表着新世界」(頁187)，激發了孫「仰英學之心」(頁173)以及要讓中國現代化的強烈願望。
意奧蘭尼學校 (檀島， 1879-1883)	孫在檀香山的英國聖公會意奧蘭尼學校經歷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和正規教育。 校監兼舍監韋禮士主教全力負責意奧蘭尼學校的校舍建設、日程秩序維持、耶教傳播以至學生的生活等。	英式教育「鐵一般的紀律」(頁208)，體現出一種「法治精神」，在孫「心靈中留下深深的烙印」(頁201)。 孫「為革命奔走一生，在經濟和其他條件都極度艱難的情況下仍然苦苦支撐，無私地堅持」，「受了韋禮士主教感染極深」(頁211)。 孫對耶教的興趣「有飛躍性的發展」(頁230)，提出領洗入教。
瓦胡書院 (檀島，1883)	傳教士芙蘭·諦文和何培為在檀香山全力推動耶教傳播付出艱辛努力。	
回村 (翠亨，1883)	孫從檀香山乘輪船到香港再轉坐普通民用帆船回到翠亨村。	清朝官吏的勒索和家鄉的落後引起孫強烈震撼，造反破壞北帝像。
拔萃書室 (香港， 1883-1884)	孫確曾在拔萃書室讀過書，該校規模甚小，可免費供讀。	孫在香港落腳，對英語世界的求知得以延續。
中央書院 (香港， 1884-1886)	孫在中央書院既攻讀了古希臘史和古羅馬史，又攻讀了英國史。	英國爭取民權的內戰史、美國獨立戰爭史「啟發了他反叛清朝的革命思想」(頁294)。
	孫在中央書院曾修習文學、拉丁文、常識等課程。	一流的教育「對於培育他獨立思考的能力，既深且遠；對於啟迪他的革命思想，也不容忽視」(頁297)。
	孫在中央書院曾修習漢譯英一課，使用古文的漢語課本，且在圖書館精讀英漢合璧之四書五經，非課餘從區鳳輝學。	奠定了孫的國學根基，此後在從醫後繼續自修，孫的一生「非常重視中國的傳統道德」(頁345)。
	孫在入學中央書院二十天後接受喜嘉理牧師的施洗，此前一直住在喜嘉理的宿舍內。	受到喜嘉理牧師「不畏疲勞，不懼艱辛，全心全意地把一切奉獻給傳教事業」(頁332)的精神影響。
	喜嘉理在孫回村成親赴香港不久，急迫要求隨孫重返翠亨村，致使孫與其兄決裂。	喜嘉理不顧一切只顧傳教的「那種迹近狂熱的狹隘宗教信仰」(頁636)，將孫推離當耶教傳教士。
英人在香港修築了薄扶林水塘，解決香港殖民地市民的食水問題。	孫在香港的生活體驗與清政府喪權辱國的「現實生活把他『拉』向革命」(頁356)。	
西醫書院 (香港， 1887-1892)	康德黎醫生創立了香港西醫書院，並為西醫的傳播付出了千辛萬苦。	康德黎的無私奉獻精神對孫在革命道路上屢仆屢起、鞠躬盡瘁產生了深遠影響。
	湯姆森醫生(牧師)為首的雅麗氏醫院干擾並掌控了西醫書院的正常運作，致使康德黎醫生的努力付諸流水。	湯姆森的政治手腕與傳教的偏激醜惡，促使孫「急於擺脫這基督神掌的控制」(頁388)，並「直接影響到孫中山最終走向革命道路的選擇」(頁366)。
	華人宣教師區鳳輝遭到英人教眾的歧視，以致捐奉驟減，傳道會利益受損，傳教士群亦不滿。	濃厚的種族歧視使孫的「民族主義反感情緒」激增，同時「當基督教宣教師或傳教士的念頭慢慢淡出」(頁391)。
	香港慶祝建埠五十周年舉行閱兵典禮，孫作為救傷隊一員接受總督檢閱。	香港與翠亨的天淵之別，使孫的「愛國主義情緒向前推進了一步」(頁395)。
	「四大寇」(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結交並高談闊論鼓吹反滿，然楊鶴齡、尤列均有名無實。	啟發、鼓舞孫深入思考投身革命與治國建設等深層問題。
行醫 (澳門， 1892-1893)	孫醫館設在議事亭前地十六A號，而非十四號；中西藥局設在草堆街八十號。	孫在澳門行醫時未曾有過革命活動；但其為洋人治病招致葡醫嫉妒，逼迫他離開澳門，「大大增加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情緒，並把他在革命道路上再『拉』前一步」(頁640)。
	孫未創立《鏡海叢報》，從早到晚全身心投入從醫以濟世。	
行醫 (廣州，1894)	因親自診治受刑病人，耳聞清廷酷刑之慘絕人寰。	孫在痛心疾首之餘，「改變那個制度的決心就愈固」(頁494)。
	上書李鴻章獻與農富國的改革建議，並推薦求見，無奈石沉大海。	孫在全力改良中國的努力徹底失敗後，才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籌備起義 (檀島，1894)	孫赴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正式展開革命事業。	甲午戰爭清軍慘敗，使孫「下定決心投身革命」(頁514)，檀香山華僑給了孫人力與物力的極大支持，至此革命思想正式付諸實踐。

分析在書中密合無間，此為黃著成功之要端。

二 兩個火頭，一條絕路

讓我們先理清黃先生對孫中山思想脈絡的分析。如果將十三歲赴檀香山求學，看作「孫中山革命性之『現代化』改革開放思想的開始」（頁635），作為一名處於衝動期的、思想尚未定型的少年，在其腦海中逐漸萌發出的是一股激烈的宗教熱情，如果這股熱情得以不斷延續，他便很可能踏上耶教（基督教）傳教士或宣教師的道路。孫中山思想的定型期則是在香港求學的前後約十年（1883-1892），這一時期所接受的教育與影響促使其「高漲的宗教情緒……慢慢地變成高漲的革命熱情這深層次性的轉折」（頁636）。再經歷澳門、廣州行醫兩年的淬煉與醞積，最終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這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形成的基本輪廓。不難看出，在這個輪廓下有一組矛盾是箝制讀者理解孫的思想發展的關卡，即在走出國門的孫中山內心幾乎同時「點燃了兩個火頭。第一，對基督教高度的熱情。第二，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頁615），這兩個火頭何以能此消彼長，糅合成一，鑄成革命之心力？

先說第一個火頭：耶教。黃著的結論是，「西方的建築、音樂、禮儀、世界觀、生活方式、一舉一動，無不深受耶教影響。當時西方文明的基礎就是耶教」，而孫中山從走出國門開始撫觸西方現代化的物質和制度文明，即與耶教混而不可分，「耶教似乎是現代化的標誌」

（頁189）。因此，孫中山的耶教觀，在根本上並「不是取其純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取其實用價值以促使中國現代化」（頁225），或者說他無意於耶教表面之儀式，而旨在抽取其合理的內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外表是個基督徒，但不全是基督徒」（頁338）。由此足以使「先生為教徒，但永不見其到教堂一步」（頁162）之類的困惑渙然冰釋。

那麼，孫中山旨在抽取的內核是甚麼？黃著從對影響孫最深的三位基督教名士韋禮士主教、喜嘉理（Charles R. Hager）牧師、康德黎（James Cantile）醫生身上概括出他們共有的不畏犧牲、無私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前後三個時期均通過耶教深深影響孫，並逐漸構成其靈魂的主導面，更成為日後其領導的革命能取得最終勝利的至上法寶。因此，合理的定性應該是「孫中山是位『無私奉獻』的耶教徒」（頁622）。這足以說明他為甚麼「沒有一點個人野心，甚至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味道」，在任何時候都「不戀棧權力」（頁621），這也正是孫區別於同時期其他歷史人物的本質特徵^①。若我們看不到這種精神實質，僅從外在教儀上苛責孫，實與其意南轅北轍。

孫中山的更高訴求在於他的第二個火頭：救國救民，就是要讓中國擺脫貧窮落後，走上現代化之路。黃先生指出：「中國需要『現代化』，這是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最基本的動因，也是他畢生忘我地為革命而奉獻的最高理想，更是他所領導辛亥革命之最終目標。」（頁648）這一個火頭在孫的血脈中可謂與生俱來，由此實際上已基本注定

黃著認為西方文明的基礎就是耶教，而孫中山從走出國門開始撫觸西方現代化的物質和制度文明，即與耶教混而不可分，「耶教似乎是現代化的標誌」。孫無意於耶教表面之儀式，而旨在抽取其合理的內核——不畏犧牲、無私奉獻的精神。

他不易走上傳教士之路，亦終將無法安於行醫以濟世，從溫和的改良走向武力革命成為必然。也就是說，第二個火頭是其思想的底層，第一個火頭必將化入第二個火頭，留待後人窮力追索的不過是轉化的時機與方式在其人生軌迹上是如何呈現出來的。雖然「現存文獻沒法讓我們滿意地回答這個問題」（頁162），但是經黃先生實證，我們可以看到：當耶教的教義與中國拜祖的傳統發生嚴重衝突時，孫絕無意於要割棄傳統，巨大的痛苦實際上已給第一個火頭撥上了一盆涼水；又當深入耶教內部，目睹傳教士之間的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甚至英人教眾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時，擺脫其形式的箝制便成為義無反顧之舉。

對歷史人物思想流變的探討，切忌簡單坐實。在這兩個火頭作為主線之外，對孫中山的思想構成影響較大的至少還有不容忽視的兩方面：西方民權法治薰染和中國傳統經史積累。對於前者，黃著充分認識到檀香山、香港英式學校鐵一般的紀律和殖民地政府成效卓著的管治架構對孫中山產生的強大衝擊，成為孫堅定改變中國制度現狀的優良模範。對於後者，黃著亦深入洞察到「三民主義當中所包含的中國優良傳統價值觀」（頁147），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孫「在鼓吹民族主義精神時，才不會像明治維新的日本那樣，步歐洲後塵而把民族主義精神刻意培植為對外侵略的武器」（頁149），甚至在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下，孫卻「在1924年於其三民主義演講中，高度讚揚儒家的王道等價值觀」（頁347）。更進一步講，其實

「在骨子裏他繼承了中國的傳統價值觀」（頁338），因此當喜嘉理牧師衝擊到孫與兄長決裂，「不孝不悌不睦族」（頁346）時，他內心深處便凝成對耶教的離心力。黃先生指出「幾千年中國古聖賢積聚下來的智慧，不但影響了他將來的行動，也直接影響了他思想的發展，並集中體現在他的三民主義中」（頁144），可謂卓識。

但是，分析到這一步實際上還無法導向選擇暴力革命之必然性，因為其間尚有溫和改良這條路可供選擇。黃先生對此認識極為清楚：「孫中山的思想歷程經過了改良、革命、改良、革命等多次轉折，最後還是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頁510），也就是說，「在改良與革命之間何去何從，孫中山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躊躇不決的」（頁400）。孫中山最終走上暴力革命這條絕路，正是以上各種思想導因共同推動的結果。

先就其導火索而言，廣州行醫時上書求見李鴻章希冀改革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破滅，溫和的改良道路「被堵死後的迫不得已的途徑」便是「採取激烈手段來排除這些障礙」（頁483），此時適值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故迅速點燃其籌策起義之火藥。而真正觸動孫中山的，恐怕更在於以下二者：一方面取決於其內心鐵定要在中國植入民權法治的新制度此時已刻不容緩，在廣州行醫時耳聞清廷酷刑之慘絕人寰，構成這最後的致命一擊；另一方面從多年後「他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不斷地提及堯、舜、禹、湯、文、武」（頁423）完全可以看出，孫受中國傳統湯、武革命之影響至深，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儼然被

當耶教的教義與中國拜祖的傳統發生嚴重衝突時，孫絕無意於要割棄傳統；又當深入耶教內部，目睹傳教士之間的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甚至英人教眾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時，擺脫其形式的箝制便成為義無反顧之舉。

真正觸動孫中山並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方面取決於其內心鐵定要在中國植入民權法治的新制度此時已刻不容緩；另一方面孫受中國傳統湯、武革命之影響至深。

視為清政府的正面代表，其猶桀、紂之血諫不納，故只可效法湯、武。孫為其行動尋覓到了中國文化強大的內推力以為保障，歷史又一次見證了「在國家危難時捨身救國，是儒家學說的最高精神」（頁164）。

黃先生深潛入孫中山之內心世界，浸淫其間，覃思之，尋繹之，假貼之，期以「個人經驗『神遊冥想』孫中山之心境，盡量希望與其『處於同一境界』」（頁163），他的做法深受陳寅恪治古史之影響^②。從「按部就班地慢慢收集史料、細細思考各重大問題之餘，最後決定把收集過程及所得全部寫出來」前後耗去了黃先生整整三十年的時光（〈北京三聯版序言〉，頁ii），三十年來一心尋覓於孫中山前半生的三十年！沉不住這顆心，便無法企及思想的自由之境，神遊冥想便可能流為主觀構境。

三 上窮碧落下黃泉

需知研究孫中山的前三十年，困難之一就是史料的嚴重匱乏，「偉人成名之前，極少有人刻意保存有關文獻。待他成名以後，再去追查，則絕大部分文獻早已湮沒」（頁626），而黃著的大突破適在以下五份新材料的集中開發與利用：

第一，紫金忠壩《孫氏族譜》舊本、節抄本、新本三份（參見第二章第三節）。三本的細密對比使羅香林持說之罅漏盡顯（下詳），至此能夠徹底「平息孫中山祖籍問題的爭論」（頁63）。

第二，意奧蘭尼學校校監韋禮士主教在1880至1881年間致其上司

英國聖公會屬下聖經聯合傳道會的負責人之一塔克（H. W. Tucker）的公私文書（參見第四章第八至九、十二節）。由此使孫中山出洋受教的第一所西式學校及第一位洋人教師之面貌浮出水面，根植入孫中山心靈的西學因子大白於世。

第三，美國綱紀慎傳道會諦文父子1884年在檀香山致美國波士頓總部之系列文書（參見第四章第十六節）。此件揭開了孫中山提出領洗入基督教之原委的面紗，黃著稱「此件為孫中山研究開拓了新天地」（頁226）。

第四，香港中央書院1885至1886年間課程考試試題及1886年劍橋大學海外試場香港地方試試題（參見第五章第十一至十四節）。此與1884至1886年間中央書院校長《年報》相配合，可彌補當年教科書失傳之憾，「用新發掘出來的史料，重建起一幅哪怕是粗略的、孫中山在香港讀中學的藍圖」（頁312），可據以詳析孫中山思想於此期大轉折之動因。

第五，香港西醫書院學術委員會、董事局1887年起的定期會議記錄和倫敦傳道會香港分部湛約翰（John Chalmers）、湯姆森（John Thomson）等牧師致總部的報告（參見第六章第二至九節）。此件作為基督教內部在香港雅麗氏醫院所展開的政治鬥爭的「確鑿證據則時至今日才被披露」（頁373），對研究孫中山第一個火頭之撲滅具有決定性意義。

此外，零星的新材料幾乎散落於全書每一章，此處不擬逐一開列。

黃先生身居澳洲，幾十年來親赴中國廣東省、香港、澳門、台灣

以及南京、上海、北京等地，以至日本，英國倫敦、牛津、劍橋，美國紐約、波士頓、洛杉磯、舊金山、夏威夷等地各大圖書館、檔案館及職能部門。孫中山所到之地，黃先生必到；孫中山未臨之所，只要課題枝節所及，黃先生亦不辭。這在黃先生1976年出版的《兩廣總督葉名琛》(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8)中已初見風貌，本書可謂集此法之大成。滿足於靜坐書齋的「閉門造車之徒」，殊難望其項背。

黃先生之新材料尚有更為龐大的另一系統，即實地田野調查所得。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長期作地毯式的實地調查，可以彌補檔案資料之嚴重不足」(頁631)。這可謂黃著區別於同類著述的最大特色，試舉一例以明之。黃先生探索孫中山在澳門行醫之史實，其中一項為考證孫醫館之位置在議事亭前地十六A號，而非早已被夷為平地之十四號，他曾經在2006年從澳洲數度赴澳門考察，「把議事亭前地的每一幢房子的門牌號碼都抄錄下來」(頁453)，並對每一幢房子都作細緻勘察，「終於找到充分的文獻、物證、地證與人證等微觀證據，證明孫中山確實曾在澳門葡人精英的心臟地帶，議事亭前地十六A號設立過『孫醫館』」，此項「雞毛蒜皮的微觀細節」，恰恰可以回答一個重大的宏觀問題，即孫中山「曾為洋人治病，結果招致葡醫嫉妒，逼他離開澳門，大大增加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情緒，並把他在革命道路上再『拉』前一步」(頁640)。孫醫館如此，孫曾經行醫的鏡湖醫院、中西藥局無不如此。經地毯式實地走

訪，黃著勾畫出一幅「孫中山澳門行醫圖」(頁478)，同時亦可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目前沒有確鑿史料顯示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曾有革命活動。」(頁440)◎

依照同樣的邏輯，黃先生抱着「微觀探索若差之毫釐，宏觀結論就謬以千里」(頁511)的執著信念，曾經在1976、1991和1996年三到夏威夷作實地考察(頁207)，且從1984年初訪翠亨村故居，二十七年來頻頻重訪(頁338)，其情其境幸虧黃先生曾遭遇過「我們都看不到，天曉得你有沒有作假」之惡聲，故在本書中不憚繁複地把追蹤史料甚至思考的過程呈現出來(〈北京三聯版序言〉，頁ii)，使我輩得以略悉梗概。筆者勾稽黃著各章行文及註釋，截取書中提及的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間密集調查廣東省各地之行蹤依序列出，俾讀者想見黃先生為此走過的足跡(見表2)。

黃先生並非定居在廣東，而是在萬里之遙的澳洲，借用「暑假三個月，寒假一個月，復活節假半月，秋假半月，一年總共五個月出國研究，一切費用自理」(〈北京三聯版序言〉，頁iii)。我們不禁要發問：是甚麼力量促使黃先生這樣「上窮碧落下黃泉」？

回答其實很簡單，因為黃先生矢志於孫中山研究，但是這一個領域已為厚重的污垢所覆蓋，為濃濃的霧圍所遮蔽。試想自羅香林《國父家世源流考》(1942)提出孫中山祖籍為紫金忠壩、其先祖為中原貴胄、其為客家人，此謬說為孫中山之子孫科以及鄒魯、吳鐵城、陳果夫、蔣介石、張繼、于右任等一致贊同，其後羅家倫、黃季陸主編的

除了對五份新材料的集中開發與利用外，新材料尚有更為龐大的另一系統，即實地田野調查所得：「長期作地毯式的實地調查，可以彌補檔案資料之嚴重不足。」這可謂黃著區別於同類著述的最大特色。

表2 黃宇和廣東省實地調查行程復原

年份	日期	地點	所得手稿
2006	3月4日	中山市翠亨村	〈翠亨村調查報告〉
	3月12日	廣州市	〈廣州調查報告〉
	3月14日	中山市翠亨村、崖口鄉	〈翠亨、崖口實地調查報告〉
		中山市外沙村	〈唐家灣、外沙村、崖口楊家村調查報告〉
	3月27-30日	中山市翠亨村及譚家山孫氏墓群	〈翠亨村調查報告〉
	4月6日	廣州市花都區	〈花都調查報告〉
	5月19日	中山市翠亨村(借黃淑嫻教授)	〈翠亨村調查報告〉
	6月4日	金星門淇澳島	〈淇澳島調查報告〉
12月4日	中山市翠亨村譚家山孫氏墓群	〈上沙調查報告〉	
2007	9月28日	中山市翠亨村	〈翠亨村調查報告〉
	12月7日	中山市磬頭尖山	有調查報告，書中未引
	12月21-22日	中山市翠亨村及周邊	〈翠亨村調查報告〉、〈實地考察中山市翠亨村附近各山崗客家墓碑調查報告〉
	12月26日	廣州市城南	〈廣州調查報告〉
2008	1月8-9日	紫金縣忠壩	〈實地考察紫金忠壩等地調查報告〉
	2月10-11日	南雄珠璣港和梅關古道	有調查報告，書中未引
	9月25日	中山市翠亨村	〈翠亨村調查報告〉
	9月26日	中山市翠亨村譚家山孫氏墓群	
	12月18日	崖口鄉	〈崖口調查報告〉
		中山市左埗頭村、涌口村、南萌村	〈左埗頭村和涌口村調查報告〉、〈南萌調查報告〉
	12月18-19日	東莞市太平鎮上沙鄉、茶山鎮圓頭山鄉	〈上沙鄉實地調查報告〉、〈圓頭山孫家村實地調查報告〉
2009	1月31日	中山市翠亨村	〈翠亨村調查報告〉
	2月11日	南雄市梅嶺	有調查報告，書中未引
	4月14日	東莞縣城、虎門要塞	有調查報告，書中未引
	12月22-24日	南雄市梅嶺、韶光市樂昌縣坪石鎮	有調查報告，書中未引

不僅是祖籍問題，黃著調查考證的每一處細節，均或多或少地糾纏着現當代繁複的政治人事關係和經濟社會實利。黃著讓史實與正義一層層浮出了水面。

《國父年譜》(1985/1994)、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1996)等均照單採錄，其影響之既深且廣可想而知。就全書邏輯上講，此問題牽涉到醞釀孫中山思想的土壤，黃先生當然不會等閒視之。更為關鍵的是，此異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更是曾經引起過兩次不大不小的政治風波以及一場官司」(頁17)，「以及學術界無休無止之筆戰」，「既破壞社會和諧，也造成民系分裂」(頁642)。作為後學了解孫中山生平的第一道門檻，蒙在其上的垢弊若不消除，研究者也便無顏自詡孫中山研究取得何等突破。

藉由黃先生從澳大利亞飛赴各地的每一次行程，筆者看到的不僅

是他扎實嚴謹、一絲不苟的踏實學風，更是道義擔當、全心付出的民族情懷，是不徇私情、不惜代價的磅礴勇力。因為不僅是祖籍問題，黃著其後調查考證的每一處細節，均或多或少地糾纏着現當代繁複的政治人事關係和經濟社會實利，均需要有文化精英挺身而出以引重鼎。黃著讓史實與正義一層層浮出了水面。

四 中國命運有所繫焉

十九世紀英國史學家阿克頓(Lord Acton)曾經指出，歷史研究不僅是從事於新發現的航行，而且是

一種面對敵對勢力的戰鬥，史學家無所畏懼，有一種神聖的義務^④。這種精神在中國史學傳統中其來有自，「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⑤。今讀黃著，筆者再一次深信中西合璧之可能。黃先生曾用一段話來概括孫中山：「他高度景仰英國的物質文明，但在人情方面，他還是不折不扣的炎黃子孫。竊以為這兩點特徵，是以後孫中山一生的縮影。」（頁189）筆者以為，黃先生之學術人生，正是孫中山中西化合的綿延再現。

歷史實證背後將迸發出濃郁的現代性。「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中國『現代化』，並非為了革命而革命」（頁482），站在辛亥革命百年的起點上，今日中國的建設仍面臨着無比艱鉅而繁雜的任務，很多問題尚處於懵懂迷茫之中。對孫中山及其時代的認識深度，恐怕正直接對應着當代學界對國家發展路向的認識。茲酌舉二例以明之。

其一，黃著曾拿章太炎與孫中山作比，認為章氏因政見不同而與孫反目，並「肆意攻擊孫中山，為革命事業帶來嚴重的傷害」，但是「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潮流是大勢所趨，章炳麟愈來愈孤立，他憤懣之餘，不思報國，最後竟然想到印度去當和尚」（頁148，註144），究其緣由，是因為「他沒有孫中山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頁649）。黃先生標注其所參考著作為汪榮祖的《追尋現代民族主義：章炳麟與革命中國》（*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其實汪所據史料是出

自章太炎致劉師培、何震夫婦五封書信及致浙江統一黨支部的一封公開信^⑥，其本人又反向揭發「孫中山對章太炎的惱怒心情，不惜以『卑劣人種』罵之」，「孫中山為了打擊章太炎，破壞其形象，據此更進一步指章乃滿清的奸細」，等等^⑦。可見孫、章交往及相關史實尚可作進一步實證研究，並據此可見兩人性情與觀念之異同及其所作所為產生的社會影響。這項研究對於當代治國策略所呈現出的多元趨向，我們將如何摒除私利，開放包容，求同存異，取鑒合作，有着強烈的現實意義。

其二，今日在中國學界，已基本認識到反對傳統與封閉自大均無法行得通，但是就傳統之於今日中國之價值究竟何在，卻各執一詞，難以調停。此問題恐怕將是阻礙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大梗阻。反觀黃著，曾說孫中山在「發覺耶教與時俱進」的同時，「反觀儒家、佛家和道家，把中國捆綁了兩千多年，令中國一直裹足不前」（頁225），又說「綜觀孫中山的一生，他非常重視中國的傳統道德，責怪的只是當時的滿清政府沒有從古訓而廉吏治」（頁345），深入全書腠理，或可解釋為孫中山的認識及覺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映襯到今日的中國學界，恐怕持此二說甚至尚有他說者正不乏其人，其間的癥結究竟何在？

再進一步說，對於孫中山的「五權憲法」，黃先生評定為是一種「天真的想法」（頁421），「把他那理想中的『萬能政府』建築在聖賢掌舵的空中樓閣之上，而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頁423），由此筆者聯想到錢穆曾經說過：「在近代中國，能巨眼先矚，了解中國傳統政治，而求能

歷史實證背後將迸發出濃郁的現代性。站在辛亥革命百年的起點上，今日中國的建設仍面臨着無比艱鉅而繁雜的任務。對孫中山及其時代的認識深度，恐怕正直接對應着當代學界對國家發展路向的認識。

把它逐步銜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推敲孫先生政治意見的最大用心處，實與中國傳統政治精義無大差違。」^⑧錢、黃之說相同中卻似有大相異。錢說生前未及論證；黃先生此前曾有專著討論三民主義思想的淵源^⑨，此番就此又進一步有所加深，然因焦點不在研索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理論架構，故其意尚未得以充分抒發，吾輩且拭目以待。

世界化潮流中的當代中國，在制度和文化建設上究竟何去何從，如何自新？這是辛亥革命百年衝擊而成的時代大課題。黃先生曾在書末說，「筆者渴望再接再厲，短期內開始鑽研及撰寫《孫文1866-1925：中國命運有所繫焉》」，又將出版約八十萬字的《鴉夢》(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中文版增訂本(頁649)。筆者相信，貫通了孫中山一生的思想，再融入第二次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的歷史背景下，黃先生必將更有深意寓於其間。

我們期待着實證史學再一次發揮出巨大的威力！

註釋

① 如黃著已指出「縱觀孫中山一生之中，結交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志士，但似乎沒有一人像他那樣『無私奉獻』」(頁633)，因此「謝纘泰等人早認識到，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忘我奉獻的，甚或認為忘我奉獻的人絕無僅有，所以才覺得孫中山像瘋瘋癲癲的」(頁552)；即使就一流人才而言，如章太炎雖國學修養深厚，然亦正因其「沒有孫中山那種『無私奉獻』

的精神，結果沉溺於個人榮辱而不思報國」(頁649)，可見此特質之擁有者絕無僅有。

② 陳寅恪說過：「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參見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79。

③ 最近有學者在黃先生的基礎上擬再探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細節，又一次提出孫在澳門期間曾「開展革命活動」，且「均與澳門華商有密切關係」，其所據僅為馮自由、葡萄牙人哥德斯(João Guedes)及孫本人的日後追記等，與黃著相較，幾無實證之效力，其結論之不足成立亦斷然可見。參見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頁71-87。

④ 引自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281。

⑤ 參見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七，頁194。

⑥ 參見楊天石、王學莊：〈章太炎與端方關係考析〉，《南開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頁38-49；曾業英：〈章太炎與端方關係補證〉，《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頁320-24。

⑦ 汪榮祖：〈所謂章太炎暗通端方的真相〉，載《章太炎散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59、61。

⑧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載《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102、103。

⑨ 參見黃宇和：《孫中山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